

“地”字的文化阐释

黄卫星¹, 张玉能²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北京 100190; 2.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地”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显示,其本义似应为“大地”,现代汉语中主要衍生出“土地”、“田地”、“地方”、“地区”、“地利”、“地位”、“见地”、“心地”等词汇。从哲学上来看,“地”是万物之本原,主要表现为中国哲学的大地载物、生物的思想,是一种质朴的自然本体论和唯物辩证法,尤其是道家思想更是突出了这种天地化育万物,道法自然的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生态文明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堪舆学(风水学)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中华民族在大地上的诗意的栖居。从伦理学上来看,“地”、“地利”、“地位”、“心地”等概念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应该考虑的重要方面;中国伦理学史上以儒家为主导的伦理规范形成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伦理道德追求,曾经对封建社会的稳态发展起着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僵化作用。从美学上来看,孔子所谓“仁者乐山”、庄子所谓“天地无言而有大美”的自然美崇敬和比德审美观,中华民族在生前死后寻找“风水宝地”的诗意栖居的审美价值取向,都显现出中华美学精神的“向内求善”的伦理型特色。在中国民间流传的土地神和土地庙,凝结了中国长期农耕文明的大地情结,寄托了中华民族的乡土之情和感恩大地自然的情怀。

关键词:地;大地;土地;地利;地位;见地;心地

中图分类号:B 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8)02-0088-06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8.02.013

文字是承载和传播文化的符号,是人类话语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工具和产品。透过每一个字及其所组成的词语的形声义的演变及其阐释,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种文字所承载和传播的文化的内涵、独特特征、变化发展。因此,我们选取了一些中华文化关键词,来进行一些文字和词语的诠释,从一个侧面来理解和阐释中华文化。下面来看“地”字。

一、“地”字的形和义

“地”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显示,其本义似应为“大地”,即“脚底下的土地”,现代汉语中主要衍生出“土地”“田地”“地方”“地区”“地位”“地利”“见地”“心地”“天地”等词汇。

关于“地”字的本义,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如是说:《说文》:地,元气充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墜,籀文地从隤。惠棟曰:“今《汉书》、《淮南子》地字皆作墜。”王筠曰:“帛读若弟,知隤之所以从帛声,即知墜之所以从帛声矣。”舜徽按:古人恒以轻清重浊释天地,《易纬·乾凿度》尤昌言之,语涉虚诞,不容取以说字。细菌据此立解,非造字本旨也。窃意天地二字,无所取象。初民近取诸身,但据人体以定名耳。盖地之言履也,底也,谓人所践履,在足之下也;犹天之言颠也,顶也,谓人所顶戴,在头之上也。《释名·释地》云:“地,底也。其体底下,载万物也。”《释名》以底释地,是矣。顾高底之限,亦必起于以人身为准,而后名有所傅。天之名傅于颠,地之名傅于履。人

收稿日期:2017-11-25

基金项目:2014年财政部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汉字数字化技术产业应用项目——汉字数字化文化体验馆第一期工程》(2014-126)和2015年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公共数字文化全国共享服务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编号:(2015BAK25B00))

作者简介:黄卫星(1974-),女,湖北蕲春人,文学博士,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人员,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中信改革发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传播、文化软实力、文化科技等方向的研究;张玉能(1943-),男,江苏南京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西方美学、西方文论、文艺学等方面研究。

身头一而足二,故曰天一地二也^{[1](P3328)}。李恩江:《常用字详解字典》说:“从土也声,形声。”列举了以下这些词语:地球、地壳,陆地,地方、地区,地板、地铺,地步、境地,地位,见地、心地,等等^{[2](P93)}。顾建平:《汉字图解字典》说:“地,会意字。从土,表示地面、土地;从也,也是古蛇字,上古时地面草木丛生,蛇虫随处可见。本义是大地。”^{[3](P117)}李榕非主编的《汉语大字典(简编本)》列举了13个义项,主要有:大地、地面,土地,疆土,地点、处所,地区,心意活动的领域,地位,位置、地盘,路程,质地、底子,等等^{[4](P200)}。宗福邦、陈世铨、肖海波主编的《故训汇纂》中列举了160个义项,主要有:土,土地,丘陵、原隰、阪险总称,山,积块,天之合也,天之根本也,政之本也,成万物也,人之所任,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载养万物,沈夺万物气也,万物之本原、诸神之根苑也,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重浊阴为地,阴也,阴精,积阴为地,地谓坤,至下谓之地,下之极也,底也,借为谛也,易也,等等^{[5](P410~411)}。

根据这些字书,我们可以确定“地”字的本义就是“大地”,“土地”。“地”字,与“天”相对,“天地”则指世界、宇宙。《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主要列举了如下的义项:地球、地壳,陆地,土地、田地,地板、地铺,地方,地区,地点,地位,地步,路程,等等,还有一些特殊的词语:地利、地理、地脉、地缘、地主,等等^{[6](P295~299)}。

二、哲学上的“地”

从哲学上来看,“地”是万物之本原,主要表现为中国哲学的大地载物、生物的思想,是一种素朴的自然本体论和唯物辩证法,尤其是道家思想更是突出了这种天地化育万物,道法自然的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生态文明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地舆学或堪舆学(风水学)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中华民族在大地上的诗意的栖居。

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思想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周易》之中。尽管《周易》是一本记录中国古人占卜预测的书,有着许许多多迷信、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东西,但是,其中毕竟总结了中国古代人类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的思考和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可资借鉴、传之后世、充满智慧的人生经验。《周易》卷一“坤”：“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文言曰：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7](P18)}在《周易》中,乾卦,象征着天;坤卦,象征着地。大地生长着万物,上面承载着天空,下面包容万物,人类生存和发展于天地之间。因此,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天地人是合为一体的,天地不仅孕育和承载着人类和社会,而且是人类道德品质的象征。每一个想成为君子的人都应该像大地那样,立地顶天,勇于担当,化育万物,宽厚包容,汇纳一切,以柔克刚,以静制动,顺时利势。由此可见,《周易》关于坤卦即大地的哲学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宇宙论的思索,更是一种人生论的考量。大地不仅仅是一种自在存在的自然,而且更是一种与人息息相关的象征性的自然,还是人类应该仿效的天生楷模。这样,《周易》经过了伏羲传说到殷商时代的肇始、周代文王和周公的演绎、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等儒家和老庄等道家的整理、魏晋唐宋等各代的阐释,就逐步成为了融合儒道思想的哲学经典和“群经之首”的典籍,阐发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宇宙论之学,尤其是人生论哲学和伦理型哲学思想,从而规定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关于“地”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理:天地人合一,厚德载物,至柔至静,承天顺时。

西方哲学的“地”主要是一种宇宙论或者自然本体论的概念,主要就是指:地球、大地、田地之类的自然存在,主要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从古到今,西方哲学中的“地”基本上都是如此。然而,在经过了古希腊的自然本体论转变到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再转向人类本体论或社会本体论的发展变化,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哲学也从人类和社会的角度来思考“地”(大地)概念范畴,尤其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更多地把“地”(大地)与人的存在(他所谓的“此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从而把“地”(大地)作为人类的根本归宿,即“诗意栖居”的处所。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栖居》(1951,孙周兴译)中说:“但当荷尔德林自己胆敢说终有一死的人的栖居是诗意的栖居时,立即就唤起一种假象,仿佛‘诗意的’栖居把人从大地那里拉了出来。因为‘诗意’如果被看作诗歌方面的东西,其实是属于幻想领域的。诗意的栖居幻想般地飞翔于现实上空。诗人特地说,诗意的栖居乃是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以此来对付上面这种担忧。于是,荷尔德林不仅使‘诗意’免受一种浅显的误解,而且,通过加上‘在这片大地上’,他特地指示出作诗的本质。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8](P468)}海德格尔的这些思想似乎是深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

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而最终形成的,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西方哲学思想的宗教信仰指向,而设计了一种“天地神人”四重性的结构,把人与世界矛盾斗争的最终指向——“诗意的栖居”归结到了这个摆脱了技术理性的“贫困的黑夜时代”的“天地神人”四重性的构想之中。于是他在《诗人何为》(1946,孙周兴译)中说:“在世界内在空间的不可见的东西中,作为其世界性统一体的天使显现出来了。在这里,世界性存在者的美妙成为可见的。唯有在美妙事情的最宽广之轨道中,神圣才能显现出来。作为冒险更甚者,诗人在走向神圣之踪迹的途中,因为他们能体会不妙之为不妙。他们在大地之上歌唱着神圣。他们的歌唱赞美着存在之球的完好无损。”^{[8](P161)}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所智慧地揭示的人与大地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诗意的栖居,在西方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给人类提醒了一个技术理性的“黑夜的贫困时代”,并且给出了一个“诗意地栖居”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解决之道。

在中国古代关于“地”的哲学概念中还生发出一种特殊的关于“地”的学说和法术,即风水学或风水术。中国古代称这种风水学或风水术为堪舆学或堪舆术,它本是一种相地之术,即在选宫殿、村落、墓地等地址和建设等等时用来实地勘察地理情况(地相)的一系列技术、方法和原则,也就是一种选择合适的居住、活动、安葬地方的技术、方法、原则的学问。它在古代涉及到中华民族先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的重要方面。风水学和风水术,在哲学思想上以中国古代原始唯物主义和素朴辩证法的气本体论和阴阳五行说为根据,逐渐形成。中国古代人们从原始社会的采集、狩猎到农耕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观念思想。他们认为,气是万物本原,世界是从无到有的“气”所形成的。气是本原,是为“一”,这个“一”的气分化出阴阳的“两仪”,这“两仪”又衍生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即所谓“五行”,这些物质的变化发展、盛衰消长都遵循着固定不变的规律,并且可以表现为一些天地的现象,人们可以从这些变化有常的天地现象中找出相应的祸福吉凶,预测人世间的吉凶祸福。相传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用阴阳八卦来解释天地万物的演化规律和人伦秩序。后来的智者贤人如周文王、周公等人将古代这些以自然现象来预测人间吉凶祸福的智慧整理为《周易》、“五行说”,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循环变化和相生相克的观念,总结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农耕文化的天文地理知识,不仅制订历法、地理,而且力图通过天文地理来掌握世间万象和人世的吉凶祸福,以确定人们的言行举止。到了汉代,人们将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观念思想相互融汇配合,

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和人生论相统一的伦理型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风水术就逐渐由卜宅、相宅的机械活动上升为风水学理论。例如,王充《论衡》中就有诸如“太岁头上不敢动土”的说法。秦汉时期还出现了关于风水的专著,《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堪舆金匱》《宫宅地形》等。魏晋南北朝时代,风水理论逐渐臻于完善,相传为东晋文学家、学者郭璞所著的《葬书》就成为了风水理论或堪舆学的经典之作。唐宋时代儒佛道三家相互对抗、碰撞、融合,对风水学产生重大影响,风水学进一步融汇了儒佛道三家关于“气”的学说,《周易》关于太极、阴阳、八卦,佛家关于因果轮回等理论,不仅丰富了风水学理论体系,也逐渐濡染了一些宗教迷信的观念信条,唐朝国师杨筠松所谓“秘密在玄空”就多少有些神秘莫测之嫌。明清时代的风水术和风水学发展到了极点,朝野上下,民间宫廷都盛行堪舆风水活动。明朝开元时的风水大师刘伯温,极大推动了风水学的发展。明末清初的“一代地仙”蒋大鸿著有《地理辩证》,以洛书的九星挨排结合地理形势来选择吉宅建筑和吉日行事,被视为近代风水理论的经典。清末沈竹初大师的《沈氏玄空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蒋大鸿的风水理论,“玄空风水”是“形、理、气、数”相结合而构成的风水学精萃,已被尊为当今风水理论的重要经典。明清两代风水堪舆之术盛行,风水论著繁杂纷呈,让初学从业者真假莫辨,无所适从,因而江湖术士招摇撞骗,传播封建迷信,助长了中国近代宫廷民间的占卜算命、择地厚葬、择日行事,迷信风水宝地、痴迷黄道吉日的愚昧无知、不信科学的社会风气,也是封建王朝穷途末路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表现。实质上,堪舆学或风水学适应于自然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来源于人们长期观察自然和改造自然地理环境的实践,有其一定的科学根据。比如,民居、皇宫、寺庙、道观、陵墓等的选址建筑在地势高低、阴阳向背、周围山水、林木花草、空间布置、通风采光等方面都可能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起居、健康寿命、情感意向。因此,风水堪舆之学术本来是根据天地时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自然变化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吉凶祸福的影响,以天、地、人三才协调和谐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点思想来指导人们的筑居、行为,以实现人们的身心安康、人生顺意、事业兴旺、社稷昌盛的目的。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所流行的风水学夸大了人类的吉凶祸福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将这种关系宿命化、绝对化、迷信化,反而把风水学扭曲成为了愚弄大众百姓、宣传蒙昧迷信、对抗科学理性、巩固封建统治、掩盖奢淫逸、麻痹人民理智的工具。今天,我们应该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风

水文化的精华,剔除其愚昧迷信的糟粕,为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构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天人协调一致的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三、伦理学的“地”

从伦理学上来看,“地”“地利”“地位”“心地”等概念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应该考虑的重要方面;中国伦理学史上以儒家为主导的伦理规范形成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伦理道德追求,曾经对封建社会的稳态发展起着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僵化作用。

伦理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人文科学。它必须解决人们的行为究竟怎样才可能是合适的,应该的。在中国长期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之中,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就十分重视人与“地”(土地)的关系,因此,“地利”“地位”“心地”等概念范畴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不论地主还是农民,都不能离开土地,因为不仅地里生长着粮食、蔬菜、瓜果树木、棉花、蚕茧等等供人们吃喝住穿,而且土地的有无和状况还直接决定着每一个人的经济、政治、道德、教育、文化等等状态,从而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决定着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的文野雅俗。因此,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广大地域的绝大多数人们都可能把“地”视为自己的命根子,即使是居住在大小城市里的一些官员、工商业主、市民等等也都与农村、农业、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像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地域的人们那样工业化、城镇化、市民化。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身份、位置、生活等等几乎都与“地”紧密相关,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和思想观念都被“地”所决定、牵制、制约着,因而,才会有“地利”“地位”“心地”这类词语的构成。比如,“地利”似乎就是指的“地”的方位、形势、高低、厚薄、肥瘠、茂荒等等状况;“地位”似乎指的就是对于“地”的关系所决定的人的尊卑高下;“心地”则似乎是指人们的思想品质像“地”一样有不同品位的比喻。正如西方解释学哲人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伽达默尔),这些词语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地”的重要性。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9](P148)} 其原意表面上看起来是谈的军事上的攻城占地之事的地理、地势上的优势,但是,实质上,表述了儒家思想对“地”和与地密切相关的农业、农村、

农民的重视。比如《管子·牧民》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10](P1)} 尽管管仲一般被认为是道家思想家或者道家和法家兼而有之的思想家,不过,管子的这种思想实质上与孟子等儒家思想也是相通的,都是继承和发挥了《周易》“地势坤,厚德载物”的必然结果,也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社会状态。正是以儒家为主的这种重农思想成为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的现实状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巩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就比较有力地巩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长期稳态发展,然而,当这种重农思想被禁锢在自然经济的狭窄范围之内,进而就逐步走向了封闭、僵化,最终就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坚船利炮所轰毁,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四、美学上的“地”

从美学上来看,孔子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庄子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自然美崇敬和比德审美观,中华民族在生前死后寻找“风水宝地”的诗意栖居的审美价值取向,都显现出中华美学精神的“向内求善”的伦理型特色。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源于夏商周三代、完成于孔夫子“仁者乐水,智者乐水”、完善于传统社会历朝历代的比德审美观,是华夏文明以“地”(土地)为依托的小农自然经济的结晶。中华民族先民们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主的生存地域,地大物博、土地肥沃、资源丰茂,滋养了勤劳节俭、厚德载物、朴实纯洁的世代代的大地之子。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开发地利,不仅以自己的劳作从大地获取了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而且以自己的智慧从大地及其产物身上获得了认知知识和审美快乐。他们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代代长期的采集、狩猎、农耕的实践活动中,亲身感受到了大地的宽广深厚,她承天载物,孕育、生育、养育着万事万物;她那么亲近可爱,时时刻刻陪伴在人们的身边,给予人们一切所需要的东西,可从来都不向人们索取回报;她默默无言地奉献着她所有的一切,随着节令的变化给人们五彩缤纷的精彩世界;因此他们把大地视为人类的母亲,敬仰、热爱、亲昵、依恋着大地母亲,他们还由衷地敬畏、供奉、祈祷着大地母亲。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5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11](P7,9)} 天地没有虚伪的“仁义”,却对万物一视同仁;天地就像一个大风箱,中间空虚而

运行不止;天地因为没有私欲,所以能够永远存在。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8](P379)}孔夫子敬仰天地的无言之德,所以他要学习天地的“无言”。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12](P33)}庄子敬畏天地的无言之美,把天地视为圣人的楷模。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就一直把大地上的山水花草等万事万物的美比附为人类的道德,这不但表现了中华美学精神对天地的敬仰尊崇,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大自然的亲近热爱。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11](P10)}水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争利,老子提倡道德高尚的人应该具有水的“不争”之德。孔子之所以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水”,也是从山水那里看到了一些类似于人类道德的“善”,让人们学习山的岿然矗立、崇高、安宁,平静,效仿水的阅尽世间万物、悠然、淡泊、不息。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9](P193)}他希望仁人志士像那泰山顶上的青松那样坚韧不拔,不畏艰苦,不怕折磨,不改初心,始终如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彰显了菊花的傲霜、淡泊、逍遥、洒脱的品质。林和靖“梅妻鹤子”,“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尽显梅花的恬淡、闲适、隐逸、孤傲,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有异曲同工之妙:“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郑板桥的竹画题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它活灵活现地显示了竹子的正直倔强,坚定不屈,不畏磨难,高傲乐观。它们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岁寒三友”“四君子”“五清”(松、竹、梅、日、月)等等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传统对象。这些对大地及其所孕育生长的事物的赞美、敬仰,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崇尚自然、比德教化的具体表现,多得不胜枚举。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地”的执着追求和炽热的爱,同样表现在中华各族人民对于“风水宝地”的选择和筑居。风水宝地,就是适于人类生存的地方,即安全、健康、便于生活、利于生产的地理位置与生活环境;人们生前死后居于其中,能够人丁兴旺、事业发达、发家致富、荣华富贵,泽及后代,世代昌盛。古代堪舆术规定:一块风水宝地的地势、地形、地貌大致上应该:四面环山,中间是一个宽敞的盆地,形成风水学所谓的“穴”,四面的山丘土石则叫做“砂”。建筑物(房屋或陵墓)就在“穴”中,后有靠山,前有案山、中有明堂,水流曲折;具有“三

奇四应”之妙,三奇即山、水、案,四应即前、后、左、右;左右有护砂;相绕四周的是山或水组成的罗城,远有朝山,近有案山。道路要屈曲,山水要蜿蜒,弯弯曲曲,曲径通幽。明堂是建筑物前面一片广阔平整的地方,明堂开阔,生机勃勃,才能前途无量。以山为罗城,以形成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凤凰)、后玄武(龟蛇相合的灵物)四种佳好态势;如果一马平川,周围无山,最好能借水势成龙,泽国环抱;山水聚气,生人借势,纳福进财,无比富贵;外洋宽阔,能容万马,后代乘势,鹏程万里,福禄延绵;抗灾祛难,家宅稳定,吉祥如意,家庭兴旺,发达安康。北京就是风水宝地的典型,紫禁城、四合院是活人居住的阳宅典范,十三陵是死人安息的阴宅代表。实际上,这样的风水宝地,从现代生态美学和环境科学来看,是阳光充足、通风透气、屏蔽寒流、排污便利、用水充沛、四通八达、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的居住地(包括活人和死人),是人们“诗意地栖居”之地。风水宝地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人们以自然来比拟人的精神、人伦道德、社会秩序,并将他们的生活理想寄托于自然山水之中,追求优美安适、赏心悦目的自然环境,讲究阴阳互补、五行相生、山水相映互动、天干地支相冲相合、日月星云流转辉映、生死轮回不息,形成了“人杰地灵”的地理环境、天地人和谐感应的生态文明。

五、民间信仰中的“地”

在中国民间流传的土地神和土地庙,凝结了中国长期农耕文明的大地情结,寄托了中华民族的乡土之情和感恩大地自然的情怀。

农耕文明是基于天地自然条件的人类创造,因而需要顺天应命、守望田园、辛勤劳作,才能自给自足、其乐陶陶。农耕文明既不擅长于侵略掠夺的战争谋略,而只需辛勤积累农林牧渔的丰收技艺;它也无需钻研尔虞我诈的经商技巧,而只祈盼风调雨顺、地利人和的生态环境。中国传统自然经济所形成的农耕文化追求“耕读传家”的理想,一方面以“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另一方面还要用“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因此,中国农耕文明融合了儒、道、佛三家文化,把道教和佛教的宗教文化融汇进国家管理、人际交往、语言艺术、风俗习惯、祭祀活动等等之中,形成了世界上最具有亲和力、开放性、凝聚力的中华文化大集成。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追求天人合一,推崇天地人神协调和谐,尊崇修身养性、乐天知命,乐天以顺应宇宙法则、自然规律,知命以彻悟生命价值和存在真谛,努力达致和谐发展,奔向“小康”和“大同”社会。

农耕文明最根本的就在于土地,因此,中华民族五

千年传统文化始终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神州大地,从而形成了民间流传不息的土地崇拜。民间流传的土地神信仰、遍布乡间地头的土地庙就是这种土地崇拜的具体表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主张“一阴一阳之谓道”,世界有阳阴两极。阳为天,具有阳刚之力,是最原始的动力;阴为地,具有阴柔之力,赋予万物以生命。与此对应,则是天乾地坤,土地被尊为人类之母。儒家尊崇土地的传统虽然与原始宗教性有关,但是主要是以华夏儿女视农业为生存之本的真实生活为根据的。在中国民间的宗教崇拜中以天为父亲、以地为母亲,天通过风(气)和水(流)传送能量给大地,大地才能孕育出世间万物。以土地为原型形成了神话思想、宗教崇拜、神仙意象、信仰象征。土地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本,因而在中国古代有人面蛇身的女娲和牛首人身的伏羲兄妹抟土造人的神话。土地是神圣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土地承载万物,孕育培养万物,生五谷杂粮以养育百姓,因而中国古人早就开始了尊天而亲地、祭祀土地的风俗,成为世代相传的民间信仰。《礼记外传》:“国以民为本,人

以食为天,故建国君民,先命立社,地广谷多,不可遍祭,故于国城之内,立坛祀之”。《汉书·五行志》:“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因此,所谓社,就是地方最小的行政单位,所以以社为单位立庙供奉的土地神又叫“社神”。《孝经》:“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13](P207)}民间俗称为土地爷、土地公公,神州大地上,凡有人烟处,都敬土地。土地本来遍及城乡,但至唐朝崇奉城隍,城市中以供城隍庙为主,于是在城里土地的辖区缩小,成为城隍的下属神,即后来所谓“当坊土地”。土地信仰的盛行是在宋代。当时无论城乡、住宅、园林、寺庙、山岳都有土地。经过种种变迁,土地神在民间构成了与普通百姓最接近、慈善可亲然而神通有限的形象。^{[13](P218)}这些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地”的热爱和信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祛除关于土地神的一些迷信成分,深刻领会其中亲近、崇仰大地的内蕴,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让神州大地更加美丽。

参考文献:

- [1] 张舜徽集·说文解字约注(第三册)[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2] 李思江. 常用字详解字典[M]. 上海:世纪出版公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
- [3] 顾建平. 汉字图解字典[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 [4] 李榕非. 汉语大字典(简编本)[M]. 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 [5] 宗福邦,陈世铄,肖海波主编. 故训汇纂[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7] 十三经注疏(上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8] 孙周兴选编. 海德格尔选集(上)[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 [9] 诸子集成(第一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10] 诸子集成(第五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11] 崔仲平. 老子道德经译注[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12]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3] 宗力,刘群. 中国民间诸神[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land

HUANG Wei-xing¹, ZHANG Yu-neng²

(1.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School of Chines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While the denotations of land include ground, field, place, region, geographic favor, position, insight and mind, etc., there are mor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i. e., origin of universe that carries biological thoughts, simple ontology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Daoism that highlights the heavenly and earthly implications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ancient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yin* and *yang* conceptions give out a constant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oetic innovation. This paper also endeavors to explore over eth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grateful earth.

Key words: land; earth; ground; geographical advantage; status; insight; state of mind

[责任编辑 刘德兴]